

拱墅文史

拱墅区文史资料专辑(二)

拱墅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杭州市唯一国家级文物
——战国一号墓战国水晶杯
(1990年出土)



杭州半山水田畝遗址
T3: M₂石刀(1958年10月出土)



杭州半山水田畝遗址
印纹陶罐(1958年10月出土)



湖墅八景--江桥暮雨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香积寺石塔



市级文物保护点--洋关

序

毛 宏

拱墅区位于杭州市的北部，京杭大运河的南起点，是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拱墅区正式命名在民国初年，以境内拱宸桥地区和湖墅地区各一字而得名。

拱墅区历史悠久，早在47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境内半山水田畈是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自隋唐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拓，拱墅地区逐步成为杭嘉湖地区的重要物产集散地。宋元始，当时称湖墅的现拱墅区域，号称“银湖墅”，成为杭州北部的十里重镇。

鸦片战争始，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甲午战争后，根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之规定，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日本在拱墅区内的拱宸桥地区强行划定租界，自此，国家蒙耻，百姓蒙难，拱墅地区的人民直接生活在日寇的铁

蹄下，更是灾难深重。抗战胜利后，腐败的国民党政
府又把拱墅人民推到内战和民不聊生的深渊之中。

文史资料素以“亲见、亲闻、亲历”为基本特征，
本书收集的文史资料，以大量的史实，记述了甲午战
争始至解放前夕拱墅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和屈辱，抗争
和奋斗以及迎接解放的喜悦，同时记述了拱墅人民当
时的生活和曾经生活在拱墅土地上知名人士思想和
经历。

让历史告诉未来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这是本书的意愿。

愿此书成为对拱墅区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当区政协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此书的时候，作为区政协主席的我，怀着对革命前辈的崇敬，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拱墅人民的热爱，对拱墅美好未来的祝愿，写下以上文字，以为序。

主 编: 林宝星

副主编: 陈人民、何菊莲、
高文举、谢作盛

编 委: 袁锦康、陈朝霞、
邵师达、包建斌、
陈晓田、沈永良
裴熙春、何永荣

封面题词: 张鸿建

封面设计: 林宝星

照片提供: 何菊莲、王起

审 稿: 陈人民

校 对: 朱保嫖、丁荣贵

目 录

白求恩的翻译——郎林·····	孙凤英口述	(1)
祥符毛家里暴动·····	孔顺祥	(6)
蒋介石的侍卫长——宓熙·····	宓秀芳口述	(10)
“洋关”的演变·····	邵师达	(26)
杭一棉子弟学校·····	陆云奎	(37)
杭一棉工人业余识字夜校·····	陆云奎	(48)
解放前夕杭一棉的护厂斗争·····	陆云奎	(57)
桑庐纪实·····	陆云奎	(80)
回顾银湖墅·····	朱世泰	(87)
女子办学与夫妇抗日·····	朱世泰	(90)
湖墅地区的左家桥、左神庙、茶亭庙·····	朱世泰	(92)
半山娘娘庙·····	倪根生、倪洪祖 等口述	(94)
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章荣林	(98)
江墅铁路线的兴衰·····	何柏山、赵振奇 口述	(100)
拱宸桥的庙会·····	范传根、何柏山 口述	(102)
拱宸桥的庙宇与张大仙墓·····	赵宝根口述	(104)

- 解放前拱宸桥的“妓、茶、赌”馆……范传根、何柏山
口述 (108)
- 解放前拱宸桥的教育状况……陆云奎、范传根
口述 (110)
- 解放前拱宸桥的医疗卫生情况……邓琴香口述 (111)
- 解放前拱宸桥的工业及商贸简况……沈松德、范传根
口述 (113)

白求恩的翻译——郎林

孙凤英口述

郎林 1907 年生于河北省武清县郎庄，原名郎维哲，1938 年参军时改名郎维廉。1939 年 2 月跟随白求恩同志做翻译，直到他不幸逝世，共同工作生活了九个月；1940 年报考华北联大时改名郎林，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离职休养后，入住浙江省军区第一干休所（拱墅区上塘路石灰坝 27 号）。

郎林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15 岁以前在农村过着贫苦的生活，父亲在北京一家帽店工作，他与两个弟弟在家帮母亲做庄稼活，没钱上学，大哥寄居在外祖父家读私塾。后来父亲到山东一煤矿找到好差使，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在小学受教育四年，后来全家都搬到北京生活。18 岁考上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该学校是教会主办的，是为适应搞殖民地化资本主义侵略的一种职业学校，学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英文会话，英文打字等事务性工作技能，该学校对学员的吸引力很大，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大部分找不到工作，但这个学校毕业后绝大多数可以保证在公司、银行、海关等机关找到工作，薪金一般也都多一些，郎林之所以到这个学校就读是因为郎林的父母也是考虑这方面的原因，受这方面的吸引。

1936年他从该学校毕业，毕业后即在北京协和医院任打字员、文书、速记员等工作，全家对此也很高兴，因为找到饭碗了。当时在协和医院工作的中国职员绝大多数民族意识比较薄弱，奴化意识比较浓厚，以西装革履、讲洋话为荣，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郎林也感染了一些殖民化思想，并学会了打牌、喝酒、讲排场应酬等虚伪的人情世故。七七事变后，日本的侵略使郎林开始厌倦协和医院这种腐败无聊的生活，一方面由于亲身体验到美国人对中国人待遇极不平等并且表现为压迫贱视中国人，另一方面受不了中国职员之间的互相排挤欺压等现象。当时他的四弟在北京，四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思想比较进步，他从四弟那儿得到一些印象：国民党是腐败无能的，延安有个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日本最害怕共产党，中国不抵抗必亡国，若想抵抗强敌必须国共合作等；此外，还知道一些抗日大学及红军英勇抗敌的事情。总的概念是中国除有一个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外，在遥远的大西北延安还有一条光明道路，进步有为的青年都想方设法奔向这条道路。1938年秋在医院一位有爱国思想职工的指引下，郎林毅然决心抛弃在别人眼里看来值得羡慕的医院工作，投奔抗日爱国武装，打鬼子保家乡去。当时，在聂荣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正在河北保定附近活动，他只带了几身衣服，借故溜出北平，直奔保定，到保定后凭胸前挂着协和医院的徽章和几句英语，出了日本鬼子封锁的城门到了解放区。

他到了解放区吕正操司令领导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

部，接待他的一位干部听说他在医院里干过，又会外语，是个“知识分子”，便把他分到了冀中军区后方医院。但没曾想到的是，刚跨入军营参加革命才几个月，也就是1939年的春天，他又与外国人打上了交道。领导找他谈话，说晋察冀军区的东征医疗队来到了冀中，说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去医疗队给一个外国人当翻译，当时他一听说又要与外国人打交道，脑子就乱了，他想起在北京协和医院里见的那些外国人，想起这些年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和痛苦……心里实在是不情愿，碍于是任务，也就按时去医疗队报到了，郎林更没想到，接触的这个外国人竟从此影响和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与职业。

郎林在回忆中这样写道：“记得那天，我与那位外国医生见面时，第一眼就产生了好感。他穿着一套褪了色的八路军灰军装，腰间束着宽皮带，脚上穿的是带红绿颜色的牛鼻子山鞋，人称‘蹬倒山’；他精神抖擞，态度和蔼，一见面，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自我介绍说：我叫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以平等态度对待我的外国人，他不但对我们八路军的干部战士这样和蔼亲切，对驻地的老乡也是这样，看到围着他转的孩子，他亲切地抚摸着他们的头；见了老年人，他总是和他们亲昵地拉家常；在村边遇到执红缨枪站岗的民兵，他总是笑咪咪地接受检查；发现生病的老乡，他会不顾一切地尽力医治，看得出来，他内心对中国人民充满着真挚的爱。但我仍纳闷：同是外国人，为什么他对中国人会这么好？一个

国外有名的医学专家，为什么不在加拿大过安逸生活，却要跑到炮火弥漫、生活艰苦危险的中国抗日战场帮助我们打仗、治病？以后，我慢慢地知道了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人，是个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再以后，当我与他一起在敌人炮火下救伤员；一起在齐会战斗中熬了三天三夜，为115名八路军伤员施行手术，拯救了他们的生命；一起在敌寇铁壁合围下为老乡开刀治病；一起熬夜，编写出《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教材；一起培训八路军医务人员时以及他在战场上亲自为我处置骨折的大腿，并像慈父般地护理我时，我才更深切地感受到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极端热情，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高尚品德，为他那“伤员第一、工作第一”的工作精神和革命必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甘于奉献一切的理想、信念所震动、感动。在为他当翻译的九个月之中，我们朝夕相处，成了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同志。”

1939年11月，白求恩同志在火线上为抢救大批八路军伤员时不幸受伤感染，得了败血症，在生命垂危时，白求恩被细菌折磨得呕吐不止，高烧得站不起来，但还坚持给在医院养伤的郎林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交待了一些需要报告、需要办理的事情，并写道“我希望明天能看到你……我一定要回前方去，”但第二天清晨五时，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诺尔曼·白求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躺在后方医院担架上的郎林失声痛哭起来。

郎林在走上人生之路之时遇到的两种外国人，前者打

碎了他的安逸梦，逼他走上“梁山”抗日救国；后者指引他真正从思想上坚定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正是在白求恩的感染下，他不但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而且也像白求恩那样选择了救死扶伤的医务事业，直至年老离休。

郎林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离休，继续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在离休的三十多年中，他翻译了八万余字的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科学论文，收集整理了约二十五万字的白求恩历史资料，对青少年进行了数百次的革命传统教育，听众达五万多人次，同时，他还撰写了《回忆给白求恩当翻译的日子》、《和白求恩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为谁活着》等回忆录近十万字。

（孙凤英系郎林妻子）

祥符毛家里暴动

孔顺祥

1922年祥符镇肇和片（今总管堂村一带）农民群众，受沾桥地区（今余杭市崇贤镇）农民运动影响，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反饥饿、反压迫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免租缓赋”吃大户斗争。同年9月吃大户斗争如火如荼、势不可挡，每到一处，杀地主家的猪、羊，打开粮仓，分地主家的粮食，使地主、劣绅闻风丧胆，纷纷溃逃。曾领导过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的农民领袖宣中华生前在《责任》周刊第九期发表文章，对这场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1928年4月，在中共西城区委的领导下，祥符镇肇和片相继成立荡坂村（今总管堂村一带）等3个党支部，翌年合并成立荡坂村党支部，由沈老虎任支部书记（今总管堂村人），支部经常集会地点在寿星桥一带（今总管堂村郭家库村交汇处），当年桥边有茶室、建有一座北厂庵。

1930年5月，在中共杭州行委的领导下，为配合诸暨为中心的浙西总暴动，祥符镇肇和片的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在沈老虎的带领下，进行了暴动。22日凌晨4时，暴动队伍鸣枪（鸟枪）开道，浩浩荡荡向毛家里进军，把大地主毛阿友、毛阿高的公馆团团围住，打开粮仓，烧毁文

契帐册及保安队的用品，保安队四处逃散。激怒的农民群众将两座公馆焚毁。同日上午10时许，暴动队伍遭到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残酷镇压。当场牺牲3人（勾庄镇人），伤4人，先后被俘82人，其中共产党员57名。暴动宣告失败。共产党员及农民积极分子沈老虎、周寿高、徐金标、许彩生、王金玉等相继被捕。党支部书记沈老虎同年初冬在东谢村（今康桥镇螺丝村、杭长线运河铁路桥东南侧）英勇就义，英烈图片陈列在云居山浙江革命烈士博物馆。周寿高死于狱中，许彩生等人迫于严刑拷打，发表退党宣言，数月后被放回，但都残废。曾帮助过沈老虎逃避追捕的村民沈有和（总管堂村人）在80年代初期也得到了政府的安置。当年，党支部受到严重破坏，但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熄灭。

1945年，日寇投降后，新四军北撤，就地隐蔽的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在省、市委的领导下，遵照中央指示，积极开展了敌后斗争。1946年9月，伪肇和乡副乡长邱其根，因贪污伪县中队公粮被逮捕，众乡亲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副乡长抓起来了，我们可以把正乡长也抓起来，甚至处死。”在这个干柴与烈火的大好形势下，党组织（据传是陀公庙和尚，姓名、身份无法考证）发动谢村（今勾庄镇）、长桥（今勾庄镇）、荡坂村（今总管堂村）、瓜山（今上塘镇）等十几个村的农民，再次举行了毛家里暴动。暴动队伍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向平时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肇和乡公所（今勾庄镇吴家厍）进发，因土匪告密，乡公所人员及保安队逃走，部分武器和用品被缴。队伍赶到伪

乡长家里（今新文村毛家里），从柴房密室中抓获伪乡长吴子云、随从文书吴阿锡。与此同时，部分农民向新文庙（今新文村）挺军，抓获了催粮很凶的保丁永林和尚并当场被激怒的农民群众用长凳击毙。群情激愤的暴动农民又将伪乡长及其随从用大石块打死，暴动进入了高潮。第二天一早，组织一户一人共一千余人的上访队伍，去国民党省政府告状，后被省府劝退，队伍返回途经米市巷伪杭县中队部门口（原湖墅南路 481 号）被堵，顿时，队伍一片混乱，当场被捕 17 人。被捕人员有新文村：陈晋楚、毛认元、徐阿有、徐天水、徐永年，总管堂村：周根法、金庆庭全家三口及王玉高（勾庄镇谢村人）、管有兴（勾庄镇管家塘人）等农民群众，其中新文村徐永年及谢村一农民坐牢死亡。因土匪告密，新文村、总管堂村及附近几村的农民群众被罚款罚米，如新文村徐阿泉兄弟俩各罚米 4 担，总管堂村吴爱春被罚米 7 担，中央币 600 元，陈梅林被罚米 5 担，关军卷（旧币）300 元，沈云贵被罚款而卖掉房子 2 间。还有沈双贵、沈寿根等等。新文村吴阿梅被罚米而逼疯，后自缚石块，投河自寻。未被捕的农运积极分子逃离他乡，造成田地荒芜、家破人亡。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中央军退出后，由土匪伪军继续对农运积极分子进行暗杀，1950 年秋天，土匪告密，土匪沈金宝（星桥村人），抓住了开葶荠商行的农运积极分子阿庆（勾庄镇陀公庙村人），用严刑拷打致死，逼迫其父把已在湖墅路明真宫避难的陀公庙和尚（姓名、身份无法考证）叫回来，当

和尚准时赴约时，土匪当场开枪打死和尚，并埋在太平桥头（今勾庄镇，吴家厍新文村交界处）。1950年冬天，土匪沈金宝等人被镇压。